

揮筆灑墨 為所當為

相信文字具有力量是知識份子堅定不移的信念；
揮筆灑墨，為所當為則是知識份子的擔當。

目次

〈書評〉

- 石之瑜
《社會科學知識新論—文化研究十評》
長篇書評
Fred Moseley, ed.
New Investigations of Marx's Method
Sean Creaven
Marxism and Realism : A Materialistic Application of Realism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rew Brown, ed.
Critical Realism and Marxism 黃俊傑 3
- 戴國輝、葉芸芸
《愛憎二·二八—神話與史實：解開歷史之謎》 莊文一 15
- 林 暉
《未完成的歷史—中國新聞改革前沿》 劉嘉薇 19
- Pierre Dabiez & Jean Klein, ed.
La Réforme De La Politique Francaise De Défense 陳明杰 23

〈書目〉

- 宮崎正勝
《圖解東亞史》 馮先祥 26
- Dorothy J. Solinger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張貴閔 28
- Charles Taylor
Hegal And Modern Society 吳昶展 30

政治科學季評

二〇〇五年三月
第五期



-
- | | |
|--------|---|
| 資深編輯顧問 | 高 朗、石之瑜 |
| 編輯顧問 | 王順文、莊國銘、廖高賢 |
| 主 編 | 連 澤 |
| 編輯委員 | 潘惠伶、莊文一、蘇軍璋
李豫宜、郭銘傑 |
| 校外編輯委員 | 廖斌洲 |
| 發行單位 |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地址：台北市徐州路 21 號
電話：(02) 2391-8756 |
-

石之瑜

社會科學知識新論—— 文化研究立場十評

黃俊傑 / 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石之瑜教授將他近年來在各地講學所撰寫的論文，彙集成為專著，題曰：《社會科學知識新論——文化研究立場十評》。承石教授的好意，先讓我拜讀全書稿本，並希望我寫一些讀後感言，我深感榮幸。

這部書在五編共十章的論述中，涉及的課題至為廣泛，但是，全書各章都環繞著一個主題：**對當代社會科學研究中具有主流論述地位的科學主義之批判與反省**。石教授在本書各章通過對於科學主義研究方法論及其實踐的批判，企圖解構以科學主義為基礎的主流論述及其霸權結構，強調文化研究在當代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重要性，從而喚醒社會科學工作者對於「他者」的平等對待，以及對於弱者（如少數民族）的關懷之情。石教授在本書各章的論述中，出入中外各家，在略帶後現代主義的文風之中，處處顯示他對於科學主義的不滿，也流露出他的悲天憫人的胸懷。我的專業領域是東亞思想史，我是一個社會科學的門外漢，對石教授這部書中有關政治學研究的專業問題，我完全沒有發言的資格。對於石教授的諸多論點，我也不能贊一詞。但是，在通讀全書書稿之後，我深深覺得這部書對於「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 或「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工作者而言，確實提出了許多值得深思的課題與論點，其中最具有方法論意涵的有以下兩個問題意識：

第一個問題是：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裡，「中國研究」對於社會科學理論的建構有何意義？石教授在本書各章的討論中，時時激發讀者沉思這

書名：社會科學知識新論——
文化研究立場十評

作者：石之瑜

出版者：國立台灣大學

出版地：台北

出版日期：2005年

一個重要的問題，例如石教授在本書第二章以孟子(371?-289?B.C.)的「魚」與「熊掌」的比喻，批判以科學主義為基礎的主流社會科學理論建構者，就像蜘蛛結網一樣地，不可避免地陷入自創一個天地，又被這個天地所圍限的困境。因此，石教授在第三章提出，作為方法論的全球化論述，正是在於引導在地人思考自己在全球格局中應有的位置，從而加強人的自我理解與自我實踐。石教授在本書第四篇的第七及第八兩章，更進一步引導讀者深思「中國研究」對二十一世紀社會科學研究的新意義。

關於這個問題，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知識界業已有所碰觸，但是在那一個歐風美雨挾其船堅炮利強力沖擊中國思想海岸，中國知識界新舊失衡、中西斷裂的時代裡，中國學者思考這個問題常不能免於激越之言論。舉例言之，哲學家熊十力（子貞，1885-1968）認為西方社會學說不適用於中國歷史研究（熊十力：《讀經示要》，台北：廣文書局，1970，卷2，頁67-68），社會史家與思想史家侯外廬撰寫《中國古代社會史》，卻是企圖以中國歷史經驗作為馬恩理論的亞洲版本之註腳（侯外廬：《中國古代社會史》，上海：中國學術研究所，1948，〈自序〉）。這些針鋒相對的意見隱約間指出：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與中國歷史經驗之間存有某種緊張性，不是中國屈從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就是完全將中國經驗視為社會科學普遍理論的例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上述激越的兩極意見稍獲紓解。1960年代初，

美國亞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AS）曾邀請美國著名漢學家勒文遜（Joseph R. Levenson）、萊特（Mary C. Wright）、史金納（George W. Skinner）、弗里曼（M. Freeman）、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崔啟德（Denis C. Twitchett）及蕭公權先生等人，各撰專文討論社會科學與中國研究之關係，集結成：“Symposium on Chinese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 刊於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XIII:4 (Aug., 1964), pp. 505-538; XXIV:1 (Nov., 1964), pp. 109-114。這些戰後優秀的漢學家都認為「中國研究」與社會科學應密切合作。國際漢學界上述這種理想，事實上並未能在漢學與社會科學研究實務上充分落實，所以已故人類學家張光直（1931-2001）在1994年仍不免吶喊：「為什麼在二十世紀的學術研究上，中國對人文社會科學作一般性貢獻的潛力完全不能發揮？」（張光直：〈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該擠身世界主流〉，《亞洲週刊》〔香港〕，1994年7月10日，頁64）。現在石之瑜教授所撰寫的這部書，以更為鮮明但更為深刻的方式，重新提起這個問題。從方法論的立場而言，我很同意石之瑜教授建議通過文化研究而批判、矯治社會科學主流論述，並補其所不足。更具體地說，任何社會科學理論如果不能充分地將中國數千年的經驗納入考量，並能解釋中國經驗之所以然，則這種理論就欠缺普遍必然性，而終不免成為一偏之見。

我們以歷史社會學家埃森西塔（S. N. Eisenstadt）為例闡釋這項看法，埃森西塔著有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Empir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istorical Bureaucratic Socie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3, 1939)一書，此書也有中譯本：閻步克譯：《帝國的政治系統》（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此書企圖對世界史上所見的各大帝國之政治系統，提出一套圓融的解釋。

埃森西塔的學問與二次大戰以後的歐美政治學的思潮桴鼓相應。傳統的政治學研究主題大多重視各國靜態的政治制度而較少涉及政治行為與政治過程，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政治系統的運作及其過程，一變而成為政治學研究之主要課題，諸如「投入—產出」(input-output)、「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政治系統」(political system)之類的名詞乃應運而生，人人耳熟能詳。首先將「系統」這個觀念用來構成一個理論系統的是大衛·伊士敦(David Easton)，他的《政治系統》(The Political System)一書於1953年問世。埃森西塔的政治系統論與伊士敦、阿爾蒙(G. A. Almond)、阿卜特(D. F. Apter)等人的學說關係密切。埃森西塔的《帝國的政治系統》一書從政治系統論出發，研究人類歷史上實行中央集權化的官僚政治帝國的政治系統。埃森西塔主張：歷史上的官僚帝國的統治者，居於政治系統的最高層，發號施令，運用社會資源。埃森西塔分析帝國的政治系統之時，非常強調治水事業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古代帝國政治運作的重要性，他認為水利事業是中華帝國的基礎。但是，埃森西塔所建構的「帝國政治系統」理論，由於他對中華帝國歷史經驗的不熟悉，而出現嚴重的破綻，我過去

曾有所討論（參看：黃俊傑：〈埃森西塔對帝國的政治系統之研究及其對中國歷史之解釋〉，收入：黃俊傑編譯：《史學方法論叢》，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4，頁157-186）。

相反地，如果社會科學理論的建構者，能夠將中國歷史經驗納入考量，那麼，其理論的周延性與普遍性必然大為提升。二十多年前美國社會學家史柯普(Theda Skocpol)分析世界近代史上的社會革命的論著，就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史柯普將法國、俄國與中國革命的經驗，放在比較的視野中加以分析，提出許多創見，對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與列寧(Vladimir Lenin, 1870-1924)的學說，既加以吸納融會，而又提出修正。史柯普的書之所以能在社會革命理論中有所創新，主要可以說得力於她在西方歷史經驗之外，再將中國經驗納入考慮，從而在三個革命經驗中既求其同，又見其異。從史柯普的例子，我們看到了中國經驗在建構社會科學理論時，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參看：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我舉埃森西塔與史柯普兩位社會科學家為例，說明中國經驗對社會科學理論的建構，所具有的不可或缺性。石之瑜教授這部書的許多論點，都啟示讀者：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裡，社會科學必須更加注意具體性與特殊性，才能更具有普遍必然性。我想在這裡進一步強調的是，石教授

在這本書中時時涉及的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後現代主義等新思潮，多半源起於歐洲或北美，較少以中國歷史經驗以及當代東亞社會政治情境作為論述之參照系。因此，石教授所強調的「文化研究」，應特別強調東亞（尤其是中國）經驗的重要性，才能使社會科學論述的「普遍性」不流為「霸權論述」，也才能同時照顧理論與實踐兩個面向。

石教授這部書引導讀者深思第二個問題是：「中國研究」的知識論基礎是什麼？這個問題在二十一世紀人文社會科學界特別值得反省。石教授呼籲應將「中國研究」作為對象加以研究，他在本書第七章開宗明義的指出：所謂將中國研究領域當作研究對象的意義有兩層，一是將既有的中國研究文獻蒐集，進行文獻的比較分析，既比較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也比較理論角度、歷史分期與議題種類等。另一層是比較研究者的身分與位置，反省研究者所從出的歷史脈絡、生活經驗與專業訓練對研究活動的影響，並追問研究者所屬機構的性質和研究經費的來源。必須對中國研究本身進行研究，才有可能更全面、更深入地體會中國研究者所提出的相關知識，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石教授進一步闡明他所謂「以『中國研究』作為研究對象」，所涉及的問題：首先是問，關於中國作為研究對象，是什麼意義的對象？亦即本體論的探究，可大別之為無本體論與有本體論。其次是在有本體論的預設下問，關於本體的知識是主觀的或客觀的？再其次，是在客觀知識的預設下

問，中國相關知識是屬於普遍性知識的一環，或是不可與其他知識共量的特殊性或相對性知識？接著，是在普性知識的預設下問，這個知識是否具有歷史終極目的與通往目的之單一途徑。第五，是在線性歷史目的論的預設下問，取得中國知識的方法論依據，是自由經濟制度主義的問題意識或唯物階級史觀？最後，是在自由經濟制度主義的方法論預設下問，採用歸納的歷史方法或演繹的理性抉擇方法，之間有何實踐意義上的差別？

石教授以上所提出的這些問題，在海峽兩岸人文社會科學界尚未獲得充分的注意，但在日本知識界卻有許多學者進行過嚴肅的思考，可以作為我們反省這些問題時的「他山之石」。

日本研究魯迅（1881-1936）的著名中國文學研究者竹內好（1910-1977），曾有一篇題為〈作為方法的亞細亞〉的演講稿（竹內好：〈方法としてのアジア〉，收入：《竹內好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80，第五卷，頁93-94），中國思想史研究學者溝口雄三（1932-）撰有《作為方法的中國》（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9，李甦平等譯：《日本人視野中的中國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頁2-3）一書，研究日本思想史的子安宣邦（1933-）也有《作為方法的江戶》（子安宣邦：《方法としての江戶》，東京：ぺりかん社，2000）一書，對於思考亞洲、中國或日本的方法，都各自提出一套看法。

竹內好等三位日本學者對於「亞洲（中國、日本）應如何被思考？」

這個問題的意見，固然互有出入，而且溝口雄三曾批判竹內好對中日兩國近代以前的歷史缺乏瞭解，子安宣邦也不滿意溝口雄三對近代中國革命在感情上過度的投入，但是，這三位日本學者都有心於跳出近代西歐「近代化」的模式，重新解讀東亞近代的歷史經驗。竹內好認為二十世紀中國從孫中山（1866-1925）到毛澤東（1893-1976）的革命，是在摸索中國模式的近代化道路，而不是照搬歐洲的經驗。竹內好認為二十世紀中國近代化的「方法」，有助於亞洲人正視亞洲經驗之特質。溝口雄三認為，思考近代中國的發展，必須注意其異於歐洲的特質。他強調，世界史的普遍的面相，只有通過個別的獨特性才能獲得彰顯（參看：溝口雄三：〈「中國の近代」をみる視點〉，收入：《方法としての中國》，頁3-35，尤其是頁30）。溝口雄三提出「以中國為方法，以世界為目的」的研究願景（同上書，頁137）。子安宣邦批判過去有關江戶時代日本的研究，常以近代西歐作為參照系。他認為應從江戶時代內部重新解讀江戶。

竹內好等日本學者所謂「作為方法的亞洲」、「作為方法的中國」以及「作為方法的江戶」的提法，與石之瑜教授所謂「以『中國』作為研究對象」的提法，有其同調亦有其異趣。雙方之所同者在於：石教授與日本學者一樣地，都有心於超越並揚棄以西方為中心的所謂「霸權論述」，他們都不滿於以近代西方發展經驗為基礎的一元化的、不能容忍「異己」的研究立場與視野。他們都在不同程度之內嚮往一個多元多樣，五彩繽紛，「萬物

靜觀皆自得」的多元世界。在這個多元化的世界中，諸多主體之間（包括個人、國家、文化等）呈現牟宗三（1909-1995）所謂「並列原則」而不是「隸屬原則」（參看：牟宗三：《中國文化的省察》，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頁68）。這是一個富有後現代意趣的文化世界與學術世界。

再進一步來看，石之瑜教授與這三位日本知識界知名學者之間仍有其重大的差異在焉。石之瑜教授所謂「以『中國研究』作為研究對象」，他所關心的是「中國研究」學者的「身份」和「位置」，亦即研究者的知識論基礎、階級立場、價值定位等研究活動的「內在」問題。石教授在本書第一章對這些問題有詳細的討論。但三位日本學者所謂「以亞洲（中國或江戶日本）作為方法」，所關心的焦點在於揚棄歐洲中心論的觀點，並從亞洲（中國或江戶日本）出發思考。他們企圖發掘並突顯亞洲（中國或江戶日本）之不同於歐洲的特質，從而建立亞洲（中國或江戶日本）的獨特性與自主性。他們思考亞洲（中國或日本）研究的相關問題，比較偏向於研究活動的「外部」問題。

以上是我誦讀石之瑜教授這部新書時，從我的研究領域出發所看到的這部書所激發的兩大問題，以及它們對我個人思考上的啟發。就其整體而言，本書是一部充滿作者慧識的作品，值得不同學科背景的讀者細讀。

黃俊傑

重建馬克思(主義)： 批判實在論的觀點

萬毓澤 / 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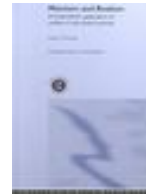
一、馬克思主義的復興

近幾年來，歐美學界對馬克思主義（尤其是政治經濟學）的興趣逐漸「回溫」，這多少與全球資本主義的危機（最為明顯地表現於幾次戰爭及主要經濟體的經濟衰退）相關（Rees, 1998）。我們或許可將之視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復興。¹舉個最近的例子：美國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Robert Brenner二十多年前曾引發所謂Brenner debate（爭議的主題為西歐由封建體制往資本主義的過渡），事隔多年後，Brenner近來對美國戰後資本主義的分析（1998；2002）在《歷史唯物論》（*Historical Materialism*）及《國際社會主義》（*International Socialism*）等左翼期刊中又引發了熱烈討論。這場新的Brenner debate涉及的學科領域更廣，至少包括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學、哲學、政治學等等。在這股浪潮中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強大解釋力重新受到了注目。或許正是因為如此，與馬克思主義關係密切的科學哲學——批判實在論——近年來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²

¹ 主流學界與傳媒近幾年來也有不少人時援引甚至吹捧馬克思（如《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1998年3月25日的一篇專欄即表示「馬克思不只是革命憤恨的先鋒，他更是一位精明而敏銳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家」），但誠如Rees（1998）所言，他們對馬克思的解讀與認識是極為片面、選擇性的：可以談資本主義危機，但不能談工人階級革命；可以談馬克思本人，但不能談整個古典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傳統（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盧森堡、托洛茨基、葛蘭西等）。

² 這當然是個需要進一步申論的課題，非本書評所能處理。

書名：New Investigations of
Marx's Method
編者：Fred Moseley 等
出版者：Humanities Press
出版地：New York
出版日期：1997年
ISBN：1573923648



書名：Marxism and Realism: A
Materialistic Application
of Realism in the Social
Sciences
作者：Sean Creaven
出版者：Routledge
出版地：London
出版日期：2000年
ISBN：0415236223



書名：Critical Realism and
Marxism
編者：Andrew Brown 等
出版者：Routledge
出版地：London
出版日期：2002年
ISBN：0415250137

二、批判實在論的理路

台灣政治/社會科學界研究方法論的文獻頗多，但大部分論者皆未曾系統地處理**批判實在論** (critical realism) 對政治/社會科學研究的啟示與影響，目前也尚未出現以批判實在論為基礎的研究。³事實上，批判實在論這幾年來的影響力日增，政治/社會科學的絕大多數領域都已經出現以批判實在論為基礎的研究（最有成果者為政治經濟學、經濟學方法論、政治學方法論、社會學方法論、社會理論等），唯台灣目前引介者仍少，殊為可惜。⁴

作為一種思潮的批判實在論，是

³ 蕭全政的兩篇重要文獻(1994; 2003: 17-28)提出「兩種社會科學典範」之說，分疏了「強調理論層面」與「強調事實層面」之兩種研究典範，並呼籲「回到開放體系，依所涉及不同主客體的生命哲學與歷史變動哲學，重新建構開放體系下的社會科學理論」(2003: 28)，似乎與批判實在論若合符節，但蕭文並沒有將批判實在論列為討論對象；再者，雖然批判實在論可能較接近蕭文所謂「強調事實層面」的理論典範，但其實很難工整地切割進該範疇。經驗研究方面少見的例外，是留學英國Lancaster大學(批判實在論的重鎮)的許甘霖，他的兩篇論文(2000; 2002)已大致勾勒過批判實在論的要旨，但他亦未詳細討論研究者該如何架接批判實在論與經驗研究。另外，汪宏倫的博士論文(Wang, 1999)也引用了一定篇幅的Bhaskar科學哲學。台灣學界目前較為完整細緻地引介批判實在論者，為郭秋永(2003; 2004)；葉啟政(2000)也曾大略論述Bhaskar的超驗實在論、社會行動轉化模式(Transformational Model of Social Activity, TMSA)及Archer的型態衍生/型態靜止模式(Morphogenetic/static model, MM model)與分析二元論(analytical dualism)等。

⁴ 各學門或次學門的研究成果可參考Ackroyd and Fleetwood (2001)、Archer (1995; 2000; 2003)、Archer and Titter (2000)、Sayer (1995; 2000)、Danermark et al. (2002)、Dean (2003)、Joseph (2002)、Patomäki (2002)、Fleetwood (1999)、Lawson (1997; 2003)、Downward (2003)、Lewis (2004)。

1970年代由英國的科學哲學家Roy Bhaskar所帶動的。「批判實在論」這個稱謂，就是後繼者將Bhaskar所提出的「超驗實在論」(自然科學哲學)(Bhaskar, 1978)與「批判自然主義」(人文社會科學哲學)(Bhaskar, 1998)兩個術語揉合而來(Collier, 1994: xi; Bhaskar, 1989: 190-1)。批判實在論發展至今，大致可區分出兩個流派。一個是以Roy Bhaskar、Andrew Collier等馬克思主義者為主的「正統」批判實在論，另一派是以Tony Lawson等非主流/異端經濟學者所發展的批判實在論。簡單來講，前者認為(1)古典馬克思主義(尤其是馬克思)所開展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以及(2)相當程度上由恩格斯集大成的**唯物辯證法**為批判實在論提供了豐富的養分(Bhaskar, 1989; Bhaskar, 1991; Creaven, 2002; Arthur, 1996)，⁵並且普遍同情或倡議社會主義變革；後者則沒有明顯的馬克思主義色彩，而是廣泛地從非主流/異端經濟學(奧國學派、演化經濟學、制度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凱恩斯學派等)中汲取靈感(Lawson, 1997; Lawson, 2003; Fleetwood, 1999)。⁶

⁵ 恩格斯的部分比較複雜，需另撰他文處理。自1960年代以來，歐美學界多認為恩格斯相當程度上是「庸俗化的」馬克思，並認為他的著作要為第二國際的演化論式馬克思主義與經濟決定論負責，甚至要為他本人晚年在德國社民黨內的改良主義行徑負責。但近幾年來漸有異議出現，如英國左翼理論期刊*International Socialism*於1994年冬季出版的恩格斯專號便重新評估了恩格斯的貢獻(可特別參考Rees [1994])；1996年之後開始有學者以批判實在論的角度詮解恩格斯(尤其是《自然辯證法》等科學哲學著作)，也提出不少新穎的看法。

⁶ Bhaskar本人曾從歐美科學哲學與社會理論

雖然我們可粗略將批判實在論區分為這兩個流派，但無庸置疑的是，批判實在論自發展以來，便與馬克思主義有極為密切的關係，不論批判實在論者是否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皆然（Hodgson：2004：69-70）。我們只要檢閱 Bhaskar、Collier 的著作，便會發現他們經常援引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來作為批判實在論的例證。另一個例子是，法國 2001 年底所出版的《當代馬克思字典》（Bidet and Kuvélakis，2001），其中就有一項條目為「批判實在論及其超越：Bhaskar 的辯證法」（Le réalisme critique et au-delà: la dialectique de Roy Bhaskar），撰寫這個條目的英國馬克思主義活動家/學者 Alex Callinicos 明白表示批判實在論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緊密關係「是一項既成的事實」（Bhaskar and Callinicos，2003：89）。因此，如何更有系統地比較兩者間的異同，以收相互截長補短之效，便成了值得深究的課題。

三、三本層次不同但互相補充的著作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們選擇了三本晚近的相關著作予以評論。首先是《馬克思方法新探》（*New Investigations of Marx's Method*）。嚴格來講，這本選集並不是以批判實在論為研究基礎的作品，全書甚至未出現「批判實在論」這個術語。但是特別引起筆者注意的，是書中收錄的兩篇論文，分別是 Geert Reuten 的〈馬克思 1894 年利潤規律中的趨勢觀念〉及 Tony Smith 的〈馬克思的社會形式理論與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

論〉。前者討論的是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所研究的利潤率下降趨勢（tendency for the rate of profit to fall, TRPF），⁷後者則從拉卡托斯的科學方法論出發，來討論馬克思的「體系辯證法」（systematic dialectics），並指出「科學研究綱領」這種方法論所蘊含的缺陷。

熟悉批判實在論的讀者應該會對「趨勢」二字格外敏感，因為從 Bhaskar、Collier 到 Lawson，眾批判實在論者皆已指出：在**深度本體論與開放系統**觀點的燭照下，我們必須從不同的層次來理解因果作用力的「擁有」、「啟動/行使」、「實現」，也必須重新思考實證主義觀點下的科學律則。批判實在論最重要的觀點之一，就是將科學律則理解為一種**趨勢**（而非〔經驗主義傳統下的〕事件/事態的恆常相連），⁸也就是**真實的因果作用力**（不論這樣的作用力有沒有在經驗層次之中顯現出來），並藉此重新闡釋（社會）科學的任務。⁹而 Reuten 這篇文章，正是引用 Bhaskar 及 Lawson 等人對科學律則的重新闡釋，也因此能言人所未

⁷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利潤率下降趨勢」理論一直受到極大爭議，Cullenberg（1994：3-12）為此爭議做了完整的介紹。

⁸ 有論者認為批判實在論此舉在於以「隱藏的機制模式」取代休謨式的「彈子球模式」（郭秋永，2003：138），休謨式的彈子球模式（billiard ball model）因果觀可見 Potter（2000：38）。

⁹ 誠如論者所言，批判實在論是一門「發展完備的科學哲學」（Brown et al.，2002：3），故無法只憑三言兩語便道盡其中精髓。讀者可參考下列必備著作：Archer（1995）、Archer et al.（1998）、Harré（1970；1986）、Bhaskar（1978；1986；1989；1998）、Collier（1994）、Sayer（1992；2000）、Potter（2000，第八章）、López and Potter（2002）、Danermark et al.（2002）、Benton and Craib（2001，第八章）。

的發展為背景，考察了批判實在論的系譜，可參考 Bhaskar（1989：180-92；1991：139-44）。

言。他的核心論點是：我們可以從兩種角度來理解「趨勢」，一種是批判實在論式的，亦即將趨勢理解為因果作用力，另一種則是受經驗主義影響的，亦即將趨勢理解為可被觀察的「結果」。他仔細耙梳各種版本的馬克思原典後，認為馬克思的立場是曖昧的，時而視趨勢為「因果作用力」，時而視趨勢為經驗上的「結果」。不論我們接不接受Reuten的結論，都不能否認這是一種詮釋馬克思的新方法。至於Smith的文章，則大幅引用了批判實在論者Andrew Sayer的重要作品《社會科學中的方法：實在論的取徑》（*Method in Social Science: A Realist Approach*），一方面指出馬克思的科學研究綱領中的「硬核」（套用拉卡托斯的說法）所指向的是資本主義中**真實**的生成機制，¹⁰另一方面則認為有必要修正評斷科學研究綱領進步與否的判準。¹¹因此，雖

¹⁰ Bhaskar (1978) 指出，這個世界（社會世界與自然世界）不應該被混同於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經驗與知識。兩者必須嚴格區分開來。也正是以此為基礎，Bhaskar批判了將「經驗」等同於「真實」的經驗實在論（empirical realism），並發展出批判實在論的**深度本體論**或**層級化**的本體論。他將現實區分為三個層次：經驗層次（empirical）、實際層次（actual）及真實層次（real）。真實層次包含各種**結構與生成機制**（自然世界如礦石；社會世界如市場、官僚體制），這些結構與機制具有因果作用力（causal power），即具有**潛力**以特定的方式產生作用；一旦真實層次的結構與機制被啟動，那麼所發生的**結果**（各種**事件與事態**）便屬於實際層次；至於人類所有感知的對象皆屬於經驗層次。經驗層次可以涵蓋實際層次（如勞動成果），也可以涵蓋真實層次（如可被觀察的某企業組織結構）。

¹¹ 簡單來說，拉卡托斯認為科學研究綱領由**硬核**（hard core）、**保護帶**（protective belt）和**啟示**（heuristic）組成。硬核為科學綱領中不容辯駁的部分，保護帶包括許多輔助假說（auxiliary hypotheses），啟示則用來指導進一步的科學研究。當研究過程中出現異例，保護

然這本選集沒有明顯的批判實在論立場，但至少這兩篇文章可說是從一種貼近批判實在論的角度來詮釋馬克思的先聲之作。¹²

我們要評論的第二本著作是《批判實在論與馬克思主義》（*Critical Realism and Marxism*）。這是歐美學界第一本同時以兩者為探討主題的文集，重要性自不待言。全書共收錄十二篇論文，其中包括一篇精簡卻不失深度的編者導言。各篇文章儘管題材大異其趣，但基本上可分為三種立場（〔1〕批判實在論可以**補充**馬克思主義；〔2〕馬克思主義**不需要**批判實在論的補充；〔3〕馬克思主義可以透過自己的範疇來**整合**批判實在論），而這三種立場也相當忠實地被反映在三位編者所撰寫的導言之中。

編者導言表示，批判實在論這門「發展完備的科學哲學」涵蓋的範圍包括「本體論、認識論、推論模式、因果關係、律則/趨勢的性質、抽象的角色、本質與表象的區分、評價理論的標準等等」，而全書各篇論文可以說就是在這些主題上面溝通馬克思主義與批判實在論。然而，要指出的是，

帶便不斷被調整或否認，同時保護硬核。如果在保護帶的調整過程中，能夠預測新的事實（novel fact），從而展現其解釋力，那麼這個綱領在科學上便是進步的。Smith同意拉卡托斯對「硬核」與「保護帶」的區分，但是不同意把「預測」當作評價進步與否的唯一標準，其實這已經極為接近批判實在論的立場。

¹² 本書是美國出版的論文集，而批判實在論在美國的影響力不若歐陸來得強，因此本書作者即使引用了批判實在論者的著作，也未必意識到自己可能正在（貼近）一個批判實在論的框架下操作。此外，限於本文主旨與篇幅，無法詳細介紹本書其他的選文，但這不代表它們不重要，請讀者自行參閱。

不是每一篇論文都像編者導言一樣深入而淺出。除了導言以外，整本文集最富創見的是（依章節順序）Bob Jessop 的〈資本主義、調節學派取徑與批判實在論〉、Sean Creaven 的〈唯物論、實在論與辯證法〉以及 Steve Fleetwood 的〈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是哪種理論？：批判實在論式的探究〉。

Fleetwood 的文筆向來犀利。身為「後自閉經濟學運動」（Fullbrook, 2003）的大將之一，他一向以批判實在論為方法論的依據來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甚至大膽表示「（濫用演繹法的）新古典經濟學什麼也沒有解釋」（Fleetwood, 2002）。同樣地，他這篇文章也是從批判實在論的角度切入，提倡因果解釋式的理論模式（對應的是質化的勞動價值理論），藉以代替演繹式的理論模式（對應的是量化的勞動價值理論），讓此文不僅扼要回顧了批判實在論對（廣義而言）波普-亨培爾模式的批判，¹³更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研究開創了新猷。

Jessop 是英國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在這篇文章中，他談的不（只）是馬克思的方法，而是具體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就是濫觴於 1970 年代法國的調節學派。如 Jessop 所言，調節學

派作為一種中層理論（middle-range theory），¹⁴在早期階段提出福特主義（Fordism）的分析架構以及「調節模式」、「積累體制」等各層次相應的概念時，所使用的正是批判實在論所一再強調的逆推法（retroduction），¹⁵也因此分享了批判實在論的（深度）本體論與認識論，而 Jessop 指出，這是因為早期的調節學派理論直接承襲了馬克思成熟時期的政治經濟學作品。此外，Jessop 指出，調節理論的研究潛力，恰恰要看研究者能否將調節學派「草創時期」的豐富方法論內涵進一步整合進未來的研究當中。¹⁶

Creaven 的文章則認為，批判實在論若能與古典馬克思主義傳統下的唯物辯證法結合，將有助於克服西方哲學與社會哲學所流行的兩種化約論（分別是將整體化約為部分的原子論，以及將部分化約為整體的整體論）。他把這種新的本體論的取徑稱為「辯證聚現式的馬克思主義」（dialectical emergentist Marxism）。Creaven 指出，批判實在論認為自然世界與社會世界所共有的一項特色就是聚現特質（emergent properties）。所謂「聚現」（emergence）意謂當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物質聚合在一起時，產生了

¹³ 簡單來講，以休謨式的因果律為核心，並強烈依賴演繹法的波普-亨培爾模式（涵蓋律模式；演繹-規律模式）認為解釋與預測兩者是一種對稱（symmetry）的關係，也就是說，若能對現象進行完整的解釋，則必然能預測現象的發展。這種看法對社會科學認識論與方法論的影響極大。完整的批判可參考 Bhaskar（1978：133-42）、Sayer（1992：169-74，226-31）、Potter（2000：44-68）、Danermark et al.（2002：106-8）。

¹⁴ 意謂調節學派「在理論抽象的程度上居於中間層次，和有關資本主義發展具體歷史敘述相比，則更為一般與抽象」（Kotz, 1994：87）。

¹⁵ 「逆推法」要問的是「什麼樣的生成機制（generative mechanisms）造就了我們所經驗到的事實」，而這種「超越事實」（transfactual）式的提問（或 Bhaskar 所謂的「超驗論證」〔transcendental argument〕），是批判實在論極度重視的研究方法。

¹⁶ 另可參見筆者的碩士論文（萬毓澤，2005）。筆者從批判實在論的角度檢討了三種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取徑，分別是長波理論、調節學派與積累社會結構理論。

全新的物質，這樣的新物質具有它自己的結構與機制，故不能被化約為它的組成成分。一個古典的例子是：氫及氧都是易燃物質，但由氫及氧化合而成的水卻可以滅火，因此，我們不能由氫及氧的性質來推論水的性質，也不能把水的性質化約為氫及氧。同樣地，社會由人與人組成，但社會結構與機制所擁有的聚現特質亦不能化約為個人的聚現特質。Creaven認為此一事實具有兩個深刻的意涵：首先，告訴我們**不能以化約論的方式來研究現實**；其次，進一步論，既然高階的層次是由低階層次所固有的各種結構與生成機制的複雜互動所聚現而來（如生物學上的各種現實，是由化學層次蘊含的各種生成機制互動結合而出現；又如社會或文化上的各種現實，是由生物層次內的各種因果作用力互動而產生），那麼這不僅呼應了批判實在論的深度本體論，更要求研究者在研究現實時採取一種**關係式（relational）**的本體論。我們必須體認到，「在這種情況下，個人會因為他們在**特定種類**的社會關係中安插的位置（而不是簡單地透過聚集個人的能力或力量）而獲得新的特性」（頁137），我們也才能瞭解為什麼「社會不僅僅是部分（人及人際互動）的加總，且這些『部分』也會因為身為整體的一部份而有所轉化」（Ibid.）。Creaven指出，批判實在論的這些洞見，雖然都可在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如托洛茨基便認為現實是所謂的「**分疏化的整體**」〔differentiated totality〕）當中找到（也就是說兩者並行不悖），但批判實在論作為一門科學哲學，卻極為完備地發展了這些概念

與範疇。另一方面，自唯物辯證法在恩格斯手中成形開始，其實就是一種本體論（恩格斯所倡議的是一種深度唯物論）的取徑，而且辯證法仍然是捕捉現實當中的「衝突動力」與「變化機制」的最好方法。

第三本著作是Creaven的《馬克思主義與實在論：實在論在社會科學當中的唯物論應用》（*Marxism and Realism: A Materialistic Application of Realism in the Social Sciences*）。這本書所談的是極為具體的（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作者的目的是重建馬克思主義，認為馬克思主義可以幫助研究者以「唯物論」的方式，將本體論與方法論上的實在論應用至社會科學研究之中。因此，作者不斷在馬克思主義與（批判）實在論的社會理論之間遊走，功力尤見。馬克思主義部分，他援引的泰半是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傳統（除了經典作品以外，主要是Alex Callinicos、Chris Harman等人的著作），實在論的社會理論方面，則有相當程度Margaret Archer的影子。

本書第一章的重點和〈唯物論、實在論與辯證法〉一文類似，大約可分成三點：（1）批判實在論所倡議的深度本體論可與唯物辯證法並行不悖；（2）辯證法能夠更有效地掌握複雜的社會現實；（3）特定形式的人類能動性（社會勞動與階級鬥爭）與社會結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具有解釋（社會體系的構成與動力）的優先性，而這也是古典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論旨。第二至四章就是由微觀（micro）、中層（meso）、鉅觀（macro）三個不同的「聚現」層次來進一步發

揮這些論點，並更具體地帶入社會科學的既有討論。

作為第一本整合批判實在論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論著作，作者的企圖極為龐大，不少地方略嫌冗贅，有時則過於抽象、欠缺實例。但整體而言，作者在理論上的創造力實在極為驚人（現在還有多少人能從「微觀」、「中層」、「鉅觀」三個層次來全面構建理論，甚至還能引用自然科學著作呢？），也難怪有論者認為「這本書的時代已經到來」（Hartwig，2001）。我們知道作者在政治上亦頗為活躍（他是英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成員），或許這正是理論創造力的來源吧！就這點來說，倒是非常貼近「古典馬克思主義」之中理論與實踐相輔相成的精神（Molyneux，1985）。

四、小結

本文介紹了三本著作，並在行文間略述了批判實在論的要旨。如前文所言，批判實在論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匪淺，部分批判實在論的先驅人物本身即是馬克思主義者。雖然歐美學界已有不少作品來深入發揮批判實在論，但長期以來幾乎沒有任何文獻處理批判實在論與馬克思（主義）兩者的關係。筆者認為，這相當程度上與馬克思主義的沒落消沈有關，也使得馬克思主義的豐富傳統幾乎無以為繼。但近幾年來馬克思主義漸有復甦之勢，從而催生了這三本書的出版，多少填補了理論上的空白。

在社會/政治科學的研究中，我們大致可以區分出三種相互聯繫的面

向：（1）社會本體論（social ontology）；（2）解釋上的方法論（explanatory methodology）；（3）具體的社會/政治理論（可參考 Archer，1995）。大致說來，批判實在論所處理的是前兩者（如深度本體論、開放系統下的因果關係、結構與行動的關係等），但也因此為第三個面向提供了完備的基礎。我們所評介的三本著作則在這三個面向上將馬克思主義帶進了討論，並與批判實在論對話，且因著重的層面不同，因此可說互相補充。第一本密集討論了馬克思所使用的方法，及其本體論、認識論上的意涵；第二本則既研究馬克思的方法（如勞動價值論的研究方法），也討論具體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如調節學派等政治經濟學理論）；第三本則是最為具體的社會理論作品。

這三本著作都不是入門讀物，都需要對批判實在論與馬克思主義（包括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理論）有相當程度的認識，但若要理解何謂活潑、開放、具科學哲學深度的馬克思主義，這三本書絕對是必備讀物。

場是：加害者與受害者的雙方絕不能以省籍簡單判

戴國輝、葉芸芸

愛憎二·二八——神話與史實：解開歷史之謎

莊文一 /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人的集體記憶，也是歷史傷痕。在本土意識抬頭的當今，過去被視為禁忌的話題可以暢所欲言，情報開放越來越容易取得，於是乎，近年來有關二二八的研究也就如雨後春筍般佔據了書店一排又一排的書櫃，其中戴國輝與葉芸芸合著的《愛憎二·二八-神話與史實：解開歷史之謎》經授權給遠流出版社後重新出版，如前一版，一問世便受到相關研究群的閱讀與引用。

作為主導本書格局的戴國輝，1931年生於桃園，就讀建中時歷經二二八事件，1955年初到日本留學，1966年獲得東京大學農學博士。歷任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日本立教大學史學系主任等職，1996年至1999年擔任中華民國總統府國安會諮詢委員。換言之，戴國輝即在日本生活42年之久(但終身不入日籍)，原因是因研究二二八而被當時國民黨政府列入黑名單中所以無法回台。

另一作者葉芸芸，是葉榮鍾的次女，葉榮鍾是當時日據時代以及國府統治時代重要文化知識份子之一。再加上有美國護照可防國民黨政府干涉，被戴認為是「採訪二二八有關人士的絕妙大前提」(自序頁11)，因此找她一同完成本書。

本書的問題意識在於，第一，二二八事件中，到底誰是受害者？第二，討論二二八時必須通盤考慮台灣當時政、經、社環境並且不能忽視國際冷戰格局的逐漸形成和國共內戰的國內結構。作者的立



書名：愛憎二·二八—神話與史實：解開歷史之謎
作者：戴國輝、葉芸芸
出版者：遠流/南天
出版地：台北
出版日期：2002年4月
頁數：385頁
ISBN：9573245868

然二分（自序頁 7）；

國民黨並非鐵板一塊，當時在台灣有嚴重派系鬥爭，並介入二二八事件的發展，而且國府與國民黨不等同於外省人、中國人（自序頁 9）；

台獨人士刻意運用國府忌諱 228 的氣氛，反利用二二八事件製造神話，藉此挑起族群情結，這種作法只會造成歷史悲劇的惡性循環，無法達到療傷止痛以及吸取教訓的目的（自序頁 10）。

本文的寫作架構以歷史排序作為章節安排，以史料分析和深度訪談兩途徑研究法為主。全文共分三篇，第一篇論述二二八事件發生的遠因與近因，第二篇則是從史實與見證人的證言中重建二二八事件發生經過，包括國府的處理過程，最後第三篇則是綜論二二八事件的後遺症以及在政治上的影響。

二二八事件是如何發生的？一般論述多半認為當時台灣行政長官陳儀的專制統治引發民怨、欺壓本省人加上台人接受日本殖民已久，受皇民化運動影響，根本上仇視中國人等等。作者認為事實顯非如此。

作者認為台灣人一開始並不仇視大陸人，相反的，當天皇宣佈戰敗時，台灣民間是欣喜若狂的，作者以自身經驗和當時史料證明此一說法，認為此種狂歡是「素樸的民族情感流露出的中華民族主義」（頁 15），但是台灣民眾當時來不及建立自己主體性，因此在慶祝中有著太多的幻想，而國府接

收人員的素質低落則是讓台灣人幻想破滅，所以後來台民的忿怒敵視是因為「天真的戀母情結」受到挫折後的反彈（頁 168）。作者在文中也批判了「台人皇民化論」者，¹認為此論的解釋與客觀實存相去太遠。

從國際結構來看，二二八事件的發生的遠因在於美國對日宣戰，中美聯合打敗日本，所以日本放棄台灣移交國府。但國府勝利後，沉醉在勝利的幻想中，並且依附美國的「二姨太」心理作祟，忽略自身慘勝的事實，視許多亟待解決的課題如黨政腐敗問題於不顧，而這些內部問題也是爆發二二八的遠因。

至於把二二八事件發生近因歸為陳儀的專制暴政以及貪污也是有問題的。從相關人士的證言和史料，就算是政敵也承認陳儀個人操守廉潔。作者認為必須注意當時隨著陳儀進入台灣的國民黨派系互動的情形方能正確掌握二二八發生的近因。二二八的發生，在於陳儀的政策由於當時受到客觀環境的影響及國民黨派系結構的影響始終無法正確落實，換言之，陳儀並沒有、也無能實際獨攬大權。更甚者，當時派系鬥爭因為搶食台灣大餅而激化。

接收人員的貪污腐敗也是近因。抗戰勝利後，國府派駐各地的收復人員充斥著抱著大發戰爭財、劫收財心態的害群之馬。陳儀治台的短短時間

¹ 認為台灣人因為受日本皇民化教育已久，將大陸人視為敵人，並從心裡認為大陸人是劣等民族。持此論者把二二八發生原因歸為台人的奴性甚重。

內，即失業率高升、貪污盛行、物價波動、治安敗壞，加上專賣制度以及台人受到差別待遇等使台人社會與心理被剝削感大幅升高，加上台人無法參政，意見管道堵塞的情形下，社會早已積怨已深，對抗已是歷史的必然，林江邁事件只是引爆二二八全台大暴動的偶發因素。

藉著還原二二八事件發生與處理過程，作者欲釐清一些事實。第一，這場暴動是自發性的，是「官逼民反」，沒有組織也沒有預謀。第二，二二八暴動中毆打外省人基本上只到三月一日，處理委員會也聲明事件之目的在於肅清貪官污吏而不在於排斥外省同胞，所以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對立不是二二八事件的主軸。第三，當時暴動的台人身穿日本軍服或唱日本國歌等行為不能被理解為台人受皇民化運動影響而敵視中國人，因為當時國語教育尚未有效，選擇日語只是反映當時時代背景。第四，當時官民組成的處理委員會本身即為各種派系勢力的競技場，並可明顯看出中統派展開對陳儀的奪權鬥爭，造成處委會的分化以及陳儀完全失去控制事件演變。第五，二二八事件並不如大陸共黨以及台獨人士所說的台灣民眾要追求獨立，而是為了懲兇、並要求高度自治權和政治改革。當時台灣人民雖不滿台灣行政長官公署，但普遍對於中國有效忠和歸屬之心。

最後二二八事件帶給台灣什麼樣的傷害？作者認為由於國民黨刻意隱瞞加上後來的白色恐怖反而讓許多細節無法釐清，遺族的傷痕無法被撫平，民眾的社會性記憶也因為戒嚴文

化病理未隨時間淡忘反而加深。總結來說，有三個層面的影響：第一是歷史的認同危機(identity crisis)，因為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接踵發生，台人在心理認同層面上發生挫折，自此鄙視中國以及中國人，統獨爭議的根源之一可謂源自於此，並且，會讓後來台人錯誤的認為日本帝國主義遺留的制度比中國進步，而提出台灣現代化是日本開始的論調。第二，語言與省籍概念被情緒化，造成概念先行，政客為圖政治利益而刻意強調省籍劃分以及割裂中國文化連結的意識形態呼籲。第三，造成了今日統獨爭議。二二八事件由於真相被鎖在黑盒子中，所以台獨教義派能長期扭曲事實，以不是主軸的省籍對立聲稱台獨運動起源自二二八。事實上，台獨運動的檯面化反而是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後，台灣的地主與資產階級既憤恨於國府在接收台灣後的裨政與「二二八」的殘酷鎮壓，又深恐中共跨海而來，損其利益才主張台獨以取代國府。

評介戴氏全文，可得知他認為二二八事件的起因有三：第一是因為陳儀治台手段無法從派系鬥爭中取得平衡，並且無法順利利用「半山」²的橋樑角色，更沒有考慮台籍大小地主及士紳階級的既得利益，所以失去人心甚至引發民怨。第二是接收人員（包括半山）素質低落，身染中國傳統醬缸文化之惡習，當然一遇到天真無邪的台灣人也就露出本來面目。第三是台灣人自身的天真讓這些劣根性重的接收人員有機可乘。換言之，此書的特點在於提供了「當時大陸派系鬥

² 意即有大陸經驗的台灣人。

爭、權謀傾軋的政治競爭影響了甫回歸中國的台灣政治」這樣的一個研究視角，也對「政治」有獨到的見解。這使研究者在論述二二八事件時，可以從平面的角度向上延伸成為立體的維度，也就是將過去單純著重於台灣內部官民對抗的分析再加上一個大陸因素，將大陸國府派系的鬥爭及國共內戰的歷史結構與陳儀治台做一有機連結，試圖架構出一個立體模型來解釋當時大陸因素如何影響到台灣的派系鬥爭，進而導致陳儀統治基礎的全面崩潰。而本書的缺點在於戴國輝雖然提出了「派系政治互動」的獨特觀點，但其缺點在於沒有把陳儀應負的政治責任詳細點出，全書似乎有意識將陳儀與當時派系惡鬥做某程度的分離，在檢討派系權謀運用時，對「半山」與台灣人苛責較多，但對更精於權謀的陳儀以及警備總部著墨較少。如果當時陳儀能獨攬大權，或者台灣人不那麼「天真無邪」的話，難道就能保證避免發生類似二二八這種因社會剝奪感過於巨大而引發的民間暴動嗎？

不過筆者仍認同戴國輝在書末所說的，把二二八研究科學化、思想化才是讓後代子孫正確且理性認識父執輩曾遭遇的歷史傷痕並記取教訓，學習恨事不恨人的根本方法。

林暉

未完成的歷史—— 中國新聞改革前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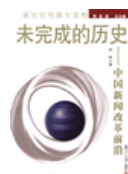
劉嘉薇 / 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國大陸的新聞改革受到學術界與實務界的重視。隨著中國大陸加入 WTO，逐步融入國際社會，媒體更是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如何新的格局下架構開放的平台，以嶄新的形象走向世界；如何與時俱進，在民主化、法制化的軌道上取得實質性的進步——中國大陸的媒體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本書簡介

本書結合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進步和變遷，對這二十多年來的中國大陸新聞改革作了深刻的回顧、反思和研究，在肯定新聞改革成就的基礎上，指出了其中衍生的問題和矛盾，針對深化和推進中國大陸新聞改革，指出了解決方案和途徑，給中國大陸的新聞改革提供方向與遠景。

過去探討中國大陸新聞改革的文章不少，主要集中在中國大陸與香港的學術界，其中中國大陸期刊網和中華傳媒學術網，這類的文章不斷增加。然而，對於中國大陸新聞改革的專書則罕見，本書「未完成的歷史——中國新聞改革前沿」實為一本探知中國大陸新聞改革歷程與影響的一本入門書，同時，它也是欲研究中國大陸新聞改革中媒體與黨國角色互動過程的參考，在新聞改革中，對於黨國角色的觀察與論述，關係著改革開放後媒體轉型中國家角色的定位，也是政治學界需要關注的問題。



書名：未完成的歷史——中國

新聞改革前沿

作者：林暉

出版者：復旦大學

出版地：上海

出版日期：2004年

頁數：551頁

ISBN：7309042115

在本書中，描述了二十六年來新聞改革的成就和特點，並闡述了新聞改革中的問題；同時介紹了WTO與當前中國大陸新聞改革的基本目標，以及資訊傳播主導權與全球化時代下中國大陸的利益。甚而進一步談到中國大陸新聞媒介格局的戰略轉換，此部份是關於二級電視、三級報紙、四級廣播的構想，以及中國大陸報業競爭結構的探討。除此之外，本書將重點放在過去黨營報紙面對的政府壓力，以及從過去「黨的喉舌」逐漸轉為具有輿論監督力量的媒體過程中面臨的問題。

本書後半部特別針對電視頻道專業化提出相關的困惑和改革，並強調編營分離是媒介資本運營的前提，唯有編營這兩權分離，才比較有可能達成專業辦報、專業經營的目標。其次論述為市場經濟與新聞報導的變革，並從新聞報導的三種視角：政府視角、百姓視角、專業視角來討論媒體內容。最後，本書也探討了媒體與公民間的互動，民主體制逐漸重視審議式民主與公共論域，因此新聞改革中的閱聽眾是公民或消費者，就成了需要討論的問題，本書也認為大陸媒體與公民的互動逐步接近審議式民主，而在邁入這公共新聞學的時代，作者也提醒新聞自律與公民媒體素養格要需要注意。

本書書評

媒體與政治的關係，是政治傳播學關注的焦點，媒體受到黨國控制的程度，關係著媒體自身發展的空間。

從書中我們探知，中國大陸近年來興起一股媒體輿論監督熱潮，從一九九二年加速報業商業化進程後，許多黨報逐漸改變政策，從「黨的喉舌」，逐漸轉向注重民意，貼近生活，盛行輿論監督的「新聞紙」。

一般而言，中國大陸對輿論監督的定義，並非如西方國家將新聞媒體視為獨立於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權」。由目前中國大陸現階段的具體實施狀況來看，新聞監督只要針對社會風氣、法紀以及政策的執行情況進行監督，以及對經濟領域發生的不良現象及廉政作風問題進行監督，甚至也有以輿論監督為主題的網站 (<http://www.yuluncn.com>)，網站內容刊載即時的網路輿論監督新聞，並建立討論區等網友互動機制。至於政治問題，特別是立法和高層政治決策過程，目前仍不可能成為新聞輿論監督的主要內容。

筆者認為，嚴格限制媒體批評報導是大陸媒體輿論監督未能達到成熟階段的阻力，例如「黨報不得批評同級黨委」、「媒體在批評刊載批評報導前，必須徵詢有關機關和被批評者的意見」、「報業編輯方針必須遵照上級黨委」等規定，都使得黨營媒體只能選擇性地從事輿論監督，對於同級黨委的弊案不得揭發，刊載的報紙也都有事前檢查的機制，使得媒體輿論監督難以確實發揮，這與「國家」和「黨」的角色介入有關，但相對來說，由於黨國與黨的介入，使得媒體內容到目前為止多為正面新聞居多，即使輿論監督的風氣逐漸盛行，但由於國家與

黨的角色仍然介入黨營媒體，在「報喜不報憂」的氛圍下，仍有媒體被政

府壓制不得發稿的新聞。

雖然中國大陸過去黨營媒體認為要報導正面的新聞，以鼓舞人心，但是由於商業化以及加入 WTO 的壓力以及改革開放的風潮，媒體也不得不報導輿論監督的負面新聞，藉此提升閱聽眾的欲求，以及落實媒體作為監督機制的角色，媒體作為一項政治社會化機制，在扮演輿論監督角色時，也關係著閱聽眾對於政治事務的看法和認知，媒體輿論監督機制在黨國體制控制下，輿論監督雖可報導政治方面的新聞，但由於黨國體制的介入，媒體不能監督同級黨委，因此難免有一些需要監督的新聞成為漏網之魚，不完整的輿論監督內容也使得政治社會化的歷程產生偏頗的疑慮，這是未來輿論監督制度可以改善之處。

但輿論監督在政治社會化的脈絡下也有其正面意義，過去黨營媒體最重要的目標即是為黨宣傳，如今興盛的輿論監督風潮也帶動了民眾間接參與政治，進而加入公共事務的討論甚至參與，這些都是輿論監督為民主進程帶來的正面意義，也是這本書給我們的啟示。

另一項本書提到的重要概念是「公民權」的問題，筆者認為，將大眾傳播媒體的閱聽眾視為公民，蘊含著一種公共參與、審議式民主的概念，公共新聞學是一九九〇年代在美國出現的新聞改革運動。它要求新聞工作者：1.將人民視為公民，即公共事務的潛在參與者，而非受害者或好奇觀眾；2.協助人民採取行動，而不僅是了解本身的問題；3.改善公共討論的環境，而非坐視其惡化；4.協助

公共生活健全運作，以增進大眾對其關切。它因此要求新聞報導必須在報導事件的同時傳遞知識、探索解決問題的策略，同時努力讓所有受同一個問題影響的人都能在報導中表達自己的聲音，並且鼓勵記者和公民之間建立對話空間。

本書提出公民權的概念，並運用在新聞傳播的概念裡，將之視為中國大陸新聞改革的前沿，雖然目前的變革狀況仍如同本書的標題所說，是項「未完成的歷史」。美國是最早發展公共新聞學概念的國家，進而促進政治參與。然而，為何中國大陸發展公共新聞學的速度急起直追？其中是否有特殊歷史脈絡背景？筆者認為，過去中國大陸黨營媒體為黨的喉舌，多報導正面宣傳式新聞，受到商業化與改革開放衝擊後，若要繼續報導以正面新聞為主的宣傳式報導為主，可能需要一套說辭，因此公共新聞學的理念很容易就被拉進來套用。當大眾傳播媒體的閱聽眾被視為公民時，整個傳播理念中國家與媒體、媒體與公民間的互動也就不同於以往，國家比往昔更需要傾聽民意、更在意媒體的批評，對於公民政治參與而言，未嘗不是件好事。然而，如同本書標題所言「未完成的歷史」，因此，未來中國大陸內部黨國角色與傳播媒體的互動，仍然需要繼續觀察。

Pierre Dabezies
& Jean Klein

La Réforme De La Politique Française De défense

陳明杰 / 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政治學碩士

Publié en 1998, sous la direction de Pierre Dabezies et Jean Klein, *La Réforme De La Politique Française De Défense* est le fruit d'un colloque organisé en mars 1997 par le Centre d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et de Stratégie (CRIS) de l'Université Paris 1 (Sorbonne), ce dernier a été pionnier en le domaine des études de défense en France des les années soixante-dix.

Etant donné que l'effondrement de l'ordre bipolaire et la disparition de la menace soviétique ont radicalement changé le contexte stratégique et que les réalités sociales françaises se sont complètement modifiées lors que des questions de défense ne puissent plus été raisonnées en termes d'antagonisme Est-Ouest, la France, après l'élection de Jacques Chirac à la Présidence, s'est prononcée en faveur de l'émergence d'une [nouvelle identité européenne de sécurité et de défense] dans le cadre d'une [alliance atlantique renouée] et des spécialistes ont donc préconisé une adaption plus directe de l'armée à l'environnement stratégique inédit auquel les européens doivent faire face. Les questions de la réforme de la politique française de défense visée a l'adaption au nouveau plan stratégique se sont donc ouvertes. Aucun secteur pourrait résoudre ces questions qui impliquent simultanément les aspects politiques, économiques et

書名：La Réforme De La
Politique Française
De Défense
作者：Pierre Dabezies, Jean
Klein
出版者：Centre d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et
de Strategie
出版地：Paris
出版日期：1998 年
頁數：150 頁
ISBN：2717836322

sociaux, un débat consacré à collecter des vues divergentes des universitaires, des officiers supérieurs, des généraux et des ingénieurs de l'armement était nécessaire, c'était la raison pour laquelle le colloque a été organisé.

Ces actes du colloque ont essayé de traiter, particulièrement, deux nouvelles questions qui ont des racines anciennes: le destin des armées de métier contemporaines françaises et l'avenir des industries d'armement européennes.

Après la fin de l'antagonisme Est-Ouest, la défense du territoire n'était plus l'objet principal de l'organisation française de force, en revanche, l'accent était mis, à l'époque, sur l'accomplissement de mission. De surcroît, les contraintes budgétaires plaidaient également en faveur d'une réduction des effectifs. Cependant, à part d'un mode de recrutement, la conscription avait un autre sens—elle contribuait à resserrer les liens entre l'armée et la nation, c'était là où se situe le débat entre ceux qui doutaient l'armée de conscription et les partisans d'un modèle du citoyen-soldat.

La France a finalement aboli la conscription et a réduit ses effectifs de l'armée de 500 à 300 mille avant l'année 2002. Durant le passage de l'armée de conscription à l'armée professionnelle, la marine et l'aviation ont été professionnalisées avant l'armée de terre. Étant un pays qui tend à

adopter le système de l'armée professionnelle, Taiwan devrait re-examiner son environnement stratégique, ses besoins de défense et la structure de sa société en faisant référence à l'exemple française. À ce titre, ces actes du colloque pourraient nous fournir des informations qui nous permettent d'avoir une vue plus complète sur la réforme de l'armée taiwanaise.

Quant à l'avenir des industries d'armement - une autre question que le colloque voulait particulièrement traiter, tous les orateurs du colloque ont fait valoir la nécessité de les aborder dans un cadre européen. Une telle nécessité avait un autre sens à part de relever les défis lancés à l'Europe par les industriels américains de l'armée — l'important c'était qu'elle pourrait également créer les conditions favorables à l'émergence d'une politique de défense proprement européenne. Pourtant, même si les européens ont affirmé à plusieurs reprises la nécessité d'une PESC et ont mis des efforts pour se doter de force multinationale dont la fonction est moins d'assurer la sécurité du territoire que d'appuyer une diplomatie préventive, les intérêts de sécurité nationale des pays au sein de l'Union Européenne sont rarement convergents et les pays membres de l'UE ne conçoivent pas des menaces.

Aujourd'hui, certaines questions traitées dans le colloque ont déjà été

definitivement résolues, certaines questions restent toujours ouvertes, la France ainsi que toute l'Europe continuent à marcher sur la voie de réforme. Même si l'UE à 25 aura évidemment encore plus de divergences sur la PESC et l'influence que l'axe franco-allemand pourrait déployer est encore moins qu'en 1998, l'année où le colloque avait eu lieu, ces actes du colloque nous permettent quand même d'élucider une série de réformes délicate qui était aperçue à la fois nécessaire dans son principe et incertaine dans ses effets, les questions abordées dans ce livre pourrait, sans doute, nous fournir des données et des points d'appui à examiner les fruits de la réforme de la politique française de défense.

Ce colloque n'a cependant pas abordé les nouveaux défis posés par le terrorisme international. Même si la France avait été dotée d'une législation anti-terrorisme spécifique en 1986 et avait, à la suite des attentats du 11 septembre 2001 aux États-Unis, inscrit sa lutte sans concession contre le terrorisme international dans le respect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es libertés publiques, elle n'a pas pour l'instant de service unique chargé de la répression du terrorisme, ce sont toujours le G.I.G.N (Groupe d'Intervention de la Gendarmerie Nationale) et le R.A.I.D (Recherche, Assistance, Intervention et

Dissuasion) qui chargent les missions de lutter contre les menaces graves à la sécurité publique. Il est vrai que les mesures de prévention ainsi que la coopération internationale avait été renforcées, or il n'y a pas encore des formes substantielles destinées à la lutte contre le terrorisme.

Ce sont toutes les questions ouvertes qui n'ont pas été abordées dans le colloque et que les Français ainsi que tous les Européens feront face dans l'avenir proche. Il est peu possible, et pas nécessaire pour l'armée française de retourner à la conscription pour répondre à la demande de la guerre anti-terroriste, une armée destinée à l'accomplissement de missions le suffit. Ce qui compte avant tout, c'est peut-être d'inscrire les dispositifs anti-terroristes dans le cadre de PESC et de mettre ce dernier en œuvre au sens substantiel en conciliant les points de vues divergentes des pays au sein de l'UE sur les dossiers d'anti-terrorisme.

宮崎正勝

圖解東亞史

馮先祥 /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如果科學普及讀物簡稱為科普，或許我們可將歷史學的普及讀物簡稱為歷普。宮崎正勝的《圖解東亞史》是一本內容簡單明瞭且生動活潑的歷普。筆者認為這本歷普有趣的地方不在如何圖解，而在東亞此一概念。

在中文的世界通用的東亞（在日本則為東洋），相對於西洋（或西方），是由歐美所界定的「他者」。這個概念在上個世紀幾經波折，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發展出一套有關東亞的政治論述，提倡東亞新秩序，藉以抗衡由歐美帝國主義所建構的舊殖民秩序。當這個新秩序，大東亞共榮圈，付諸實踐之時，其結果卻是諸如屠殺以及慰安婦等戰爭暴行。令人感到諷刺、矛盾與錯愕。日本的侵略讓東亞背上莫名的原罪。東亞這個詞彙在二戰結束後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在日本一直相當敏感，直到全球化論述的興起後才帶來新的契機。

簡單來說，全球化就是跨越民族國家的疆界。當跨國經貿文化交流越來越頻繁之際，歷史學也追隨全球化的風潮，跳脫國別史的思維，以區域史的框架重新看待自己與四周的關係。宮崎正勝認為，日本人應該對自己身處的環境有基本的認識，才能懂得如何和鄰居相處。《圖解東亞史》正是基於這樣的理念而產生。日本所處的東亞世界在十九世紀之前是以中國為核心，而十九世紀以後則以歐美列強為核心。現在的東亞則是被中、美、俄等三國所包圍。宮崎正勝對東亞的界定相當特別。他心中的東亞不是政治與地理的交集，而是政治與地理的聯集。美



書名：圖解東亞史

作者：宮崎正勝

譯者：葉婉奇

出版者：易博士文化

出版地：台北

出版日期：2004年

頁數：326頁

ISBN：9867881400

國並不屬於這塊地理區，但政治上卻有很大的影響力。所以筆者形容其背後的邏輯是聯集而非交集。此外，甘懷真在推薦序(〈波心連動的東亞歷史世界〉)中所形容的東亞卻是一個在歷史文化上「波心連動」的東亞。他的東亞偏重歷史文化與地理的交集。政治退居其次，美俄因此不見了。這不是很值得玩味嗎？兩個人所指涉的地理區域大致相同，卻有深刻的差異。

不光甘懷真與宮崎正勝建構的東亞有歧異，今日的東亞可謂人言言殊。這樣一個模糊的地理區可以是歷史文化的，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經濟的。例如，東亞區域安全與東亞儒學之間，兩個東亞就不盡相同。又例如，臺大政治系的東亞民主化與價值變遷比較調查研究中心與校總區的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也暗示兩個不一樣的東亞。話雖如此，但任何一種界定卻又必然包含中國大陸，日本，與朝鮮半島等三地。換句話說，東亞的概念似乎又有共通的基礎。東亞所指涉的範圍到底在那裡？我們不必對這個問題持有標準答案。我們只要記住：東亞是一個各自表述的概念。除了中國大陸，日本，與朝鮮半島等基本構成外，其餘的部分皆由界定者全權決定。

大體而言，《圖解東亞史》的文字淺顯易讀，配合生動的圖表，又沒有瑣碎的歷史敘事，讓讀者可以很輕鬆地鳥瞰整個東亞的歷史輪廓。此外，宮崎正勝的寫作重心擺在近現代的歷史發展。例如，坊間的中國通史對於

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大多有相當詳細的敘述。就算沒有獨立成一章，大概也要自成一節。《圖解東亞史》只利用1~2頁的篇幅就草草帶過，而19世紀之後的歷史大約佔全書1/3的篇幅。重今輕古的比重分配相當明顯。其主因大概是作者的特殊關懷有關。這一點值得讀者在閱讀時稍加留意。不論如何，就普及讀物的標準來說，這本書值得推薦。

這本《圖解東亞史》附帶的三篇文章，包括推薦序，序(〈重新省視亞洲世界〉)，以及後記(〈東洋史的現代意義〉)等，對東亞此一概念有相當精采的介紹，很值得我們好好咀嚼其中的意涵。我們不一定要同意宮崎正勝的歷史觀，但可以藉由這幾篇文章重新反思我們理所當然地理解東亞的態度。

相關主題推薦：

子安宣邦，〈「東亞」概念與儒學〉，文收 高明士 編，《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 儒家思想篇 —》，台北：台大歷史系，2003。

甘懷真，〈所謂「東亞世界」的再省思：以政治關係為中心〉，文收 甘 著，《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台北：喜馬拉雅基金會，2003。

葛兆光，〈想像的和實際的：誰認同「亞洲」？— 關於晚清至民初日本與中國的「亞洲主義」言說〉，《臺大歷史學報》第30期，2002年12月。

Dorothy J.
Solinger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張貴閔 /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T. H. Marshal 在其著名篇章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中，提出現代公民權利的發軔與資本主義興起的關聯性，認為資本主義的蓬勃需要能夠自由訂定契約的個人作為市場的勞動力，此為促成初始公民權發展的原因之一。

在本書中，Solinger 對 T. H. Marshal 的「資本主義的興起」與「現代公民的產生」兩者之間的線性正相關概念在中國農民工的適用，提出不同的看法；中國改革開放後，引進市場經濟，並於 1984 年解除對城鄉人口移動的限制，導致大批農村過剩勞力湧入城市，這些民工對城市地景與人口造成的衝擊包括：公共設施負荷量不足，增加城市私部門勞動市場的競爭力，外來人口難以控管的治安等種種問題，整個制度的分化設計，形成中國特有的城鄉二元體制，使城市居民在面臨外來者時，產生城市專屬的公共財概念，Solinger 稱之為“urban public good regime”，而此引發城市居民對民工普遍的敵視現象；然而，民工也為資本主義新興市場注入源源不絕的廉價勞動力，對都市經濟的發展，貢獻斐然。

Solinger 將中國民工所遭受的歧視與福利國家崩潰時的現象做類比，在政府無力負擔市場經濟的風險時，人們傾向於讓外來者成為資本主義所造成不穩定社會現象的代罪羔羊，此現象普遍發生在一九七零年代的全球經濟危機，使外國人成為歸咎的對象；尤有甚者，農民工身為中國國民，在中國境內所處的地位就如同南非的黑人與美國前半世紀的



書名：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作者：Dorothy J. Solinger

出版者：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出版地：Berkeley

出版日期：1999

有色人種，他們所遭受的是一種身份上的歧視，連最基本的民權與人權都無法獲得，而這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國的戶籍制度，戶籍除了身份上的象徵外，還包括一連串的制度設計，如：糧食供應制度、住宅制度、教育制度、就業制度、醫療制度、養老保險制度、勞動保護制度、兵役制度、婚姻制度、生育制度等；當中最主要的是它附加的價值：社會福利與資源，當中最重要的是社會機會，例如受教育和工作機會，人一生如何發展，戶籍佔有決定性的關鍵。

資本主義在中國蓬勃發展，戶籍制度仍然限制這一批市場經濟帶來的民工融入城市，城市官僚從此二元體制中獲益；而城市居民有了市場理性計算的概念，排除競爭者的心態；加上廉價勞工為目前中國在世界市場競爭中最佳的經濟秉賦，中國仍需廉價勞工作為資本積累的工具；資本主義新興市場結合舊社會主義國家的遺緒，阻礙民工獲得城市公民的身份，他們作為創造市場經濟的基石，卻被排除在分享資本主義碩果的列車之外。

本書以「競合」(contesting)的觀點，解釋農民工的地位是由於中國邁向市場經濟各造行為者包括國家、政策、市場、民工相互間角力運作的結果，對於較全面地認識中國政治與經濟發展的圖像，有很大的幫助，而其文字通暢簡明，並佐以許多田野實證，值得一讀。

Charles Tayl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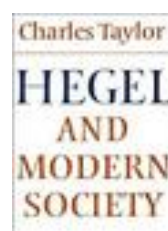
黑格爾與現代社會

吳昶展 /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如果Hegel無論如何都很難了解，詮釋Hegel的工作者們則不可不謂任重道遠，最常見的方法是以其生平著作出版的順序一一介紹，¹或以專題方式切入某個議題，²再不然就是從近代哲學思潮或政治思想的發展中將他帶出，³既然各種形式應有盡有，相對使得對這些工作者的再解釋顯得有點多餘，頂多做點書摘的工作。但Taylor的作品卻是個例外，不單是因其接受了詮釋的方法論，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也自成一格，從代表感性的表現主義與理性的徹底自由的統合運動切入，直接對Hegel作出詮釋，從而也能將本書的空間開放給讀者，依他們的生活情境或是問題意識，對Taylor甚至Hegel重新安排。

一、自由與表現

由Descartes、Grotius以及Hobbes在哲學、法學以及政治學領域中帶領的啟蒙思潮，將因新教改革而沉寂的自然法改造成現代的理性模式，從而主導著歐洲思想界的發展直到十八世紀，⁴而黑格爾的哲學綜合也就是針對兩股向啟蒙運動反動的潮流而



書名：黑格爾與現代社會

作者：Charles Taylor

譯者：徐文瑞

出版者：聯經

出版地：台北

出版日期：民國 79 年

頁數：272 頁

¹ 例見，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New York, 1954)以及Richard Kroner 著，關子尹譯，《論康德與黑格爾》，聯經出版，1985。

² 例見，Joachim Ritter, *Hegel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Essays on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ichard Dien Winfield.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82)

³ 例見，Karl Löwith, *From Hegel to Nietzsche: The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Thought*. (New York, 1964)

⁴ 見A. P. d'Entreves著，李日章譯，《自然法》，聯經出版，1984。

發。第一種是狂飆運動的表現主義，第二是康德的徹底自由論，前者反對啟蒙運動將人當作客觀化的主體，而視人的生命具有一種統一性以及隸屬於一個文化/共同體的要求，人必須恢復與自然的合一才能作為一個表現的存有者；後者則反對功利主義的道德定義，認為啟蒙的理性仍然無法擺脫對自然的依靠，而只有將人作為一純粹的道德意志，才可達到真正的自由。這兩種觀點的巨大衝突，即自然合一的表現圓滿與自我決定的徹底自由，成為十八世紀晚期的德國知識份子尋找個人認同時最重要的議題。與浪漫主義者企圖消弭此衝突的目標一致，藉由線性發展的歷史觀理解人類的發展是為了達到另一個更高的統一與完美，而人類的自我意識(self-consciousness)則非單純的把握自然，而為宇宙精神的完成，Hegel的不同之處在於強調以理性(reason)來達成自律與表現兩者對立的和解(reconciliation)。

這裡有兩個問題，最重要的是，自律與表現的和解與現實生活有何關係？如果只是一些概念上的玄思，則何必將時間精力投注於這項事業之中？第二，理性是什麼？從 Plato 以降，理性的概念就不曾離開過西方，則怎可將解決問題的希望寄於之？

二、理性的難題

試先從理性談起，Taylor 在文中對理性傳統曾作出一點簡單的介紹，大體而言將之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 Plato。理解屬於理性的(rational)、大於人類秩序的結構的能力謂之理性，因此前提是一個高於人類的秩序。啟

蒙的理性觀反對這個前提，認為主體是自我界定的；理性在 Hobbes 與功利主義者的理解下，成為一種計算的能力，社會組織成型的前提成為一種契約論。對啟蒙這套論述的批判，主要針對的是那自圓其說的自然法體系，一方面因道德以及邏輯的必然性之混淆，使得價值判斷必須在一開始就作出預設而顯得空洞，理性與自然的關係也就無法被解釋清楚；二來也因此無法將意志擺脫自然而單獨從前者抽引出義務的內容。由此發展出的第三種理性之特色，在於與自然的對立，Hegel 要處理的就是這個對立。

Hegel 在不放棄理性的前提下進行的綜合，是挑戰二分法的對立，例如人與自然以及現象與物自身的對立，認為這些對立項之間在通過徹底的了解之後才會呈現其真正的關係，對立又同等，這種有別於一般邏輯的矛盾率的思考方式，是為辯證。要了解辯證，首先得從 Hegel 的主體理論著手。在融合了 Aristotle 的形質合成論(hylomorphism)以及 Herder 的語言表現理論之後，Hegel 的主體是理性的動物且又是表現的存有者。就後者言，作為實現「必然體現原則」表現的存有者，不只是彌補了 Descartes 的心物二元斷裂，更重要的是這個存有者在表現主義推導出的存有層系中，佔據了頂點的位置；就前者言，意識要求人類達到思維的清明和自足，使得生命產生不和諧以及區別以達到自由。這兩個特性使得主體是一個充滿衝突的領域，換句話說，Hegel 的主體具有兩個向度：目的的實現以及體現的存在條件。

三、絕對精神的主體

但憑什麼說服人類相信這一套主體論述？Hegel 認為這一套主體適用於絕對精神，是上帝設定了自己的存在條件而又將自身在宇宙中表現出來。但即使作為無限的存有者符合 Hegel 主體論的條件，那麼作為有限主體的人類呢？從表現主義以及意識理論都可以確認，如果絕對主體必須在自由中達到理性的自我意識，在設定宇宙時一定需要包含有限主體，並且以有限精神為媒介來意識到自身的結構，如此才能達到絕對精神的自我意識。箇中的意義是，我們將身分的重心轉移，不在關注於人而轉移到宇宙精神，現在要證明的，不是人的主體性存在，而是絕對理性的主體存在，只要決定理性主體性的存在，則萬物的存有結構及可被確立。

Hegel 的證明方法是理性的必然性，以概念的極限 (conceptual limit) 說明理性之必然性是由絕對精神所設定，而萬物的存在也是依照如此的設計，精神設定有限的存在，而由後者闡明前者的計畫。此話怎解？絕對精神的主體，存在條件與其自身目的齟齬不合必須靠有限精神來克服以達到自我認識的目的，換句話說，精神的存在是靠著中介的 (mediated)；同樣的，有限精神也蘊含著內在矛盾，更重要的是，Hegel 的上升辯證法企圖從揭露有限存在的矛盾進而彰顯其存在得依附於大整體，也就是無論在整體意義或是部份意義中矛盾所蘊含的存有學衝突都是必要的 (也就是中介)，但兩者於存有學上無限以及有限的差別導致了後者的毀滅，例如，個

人、種族、文明；整體在有限者死亡的同時卻因此而維持著他自身，理性的計畫在此得到說明，並且也只有在被如此的表現時才能被指出，因此矛盾是整個存有的發動依據。從推論的必然性轉移到存有的必然性，Hegel 逃開了循環論證的指控，而從存有學中解決了二元對立。

四、歷史的辯證

但是 Hegel 存有學上的「矛盾」絕對不只處在觀念之中而有現實的對應，歷史辯證法所要說明的其實與存有學辯證法為一體兩面。人為了認識到自己的身分 (絕對精神的媒介)，必定會建立生活共同體，而國家則代表了此共同體的最高境界。但在達到絕對理性的國家之前，中間的階段也是必須的，因此法國大革命之後的脫軌、雅各賓黨恐怖政治的浩劫，皆是對應於啟蒙時代基於康德的道德形式主義以及盧梭的普遍意志倫理而要求絕對自由 (absolute freedom) 的實踐，這種空洞的概念會摧毀掉一切社會制度而無法重建。但歷史中的事實卻自有其意義，理性的狡猾使得理性的進程得從人類行為的結果得知，行為者是無法知道自己背負的歷史責任為何的。在此可以回答之前的第一個問題，Hegel 對歷史的詮釋，說明思想可能是一種歷史動力，且思想本身所欲者並不是單純的為意識形態背書，而是因其哲學本體論而發。準此，對日常語言以及政治論述背後的哲學預設作一番探討，也就不再非關政治，而可為政治學中另外一條可行的進路。

【徵 稿】

為能對當代政治學知識發展與時俱進，提升並促進學術之反省對話，推動全國政治學相關系所之學術參與及交流，本刊公開徵求對政治科學相關學術著作之「書評」與「書目」，期許引領暨提升學術研究之風氣。

- 徵稿對象：全國政治科學相關系所師生
- 稿件內容：
 - (一) 一般書評：政治科學相關中、外文學術著作之評論（其中至少應有二分之一以上篇幅作為內容引介），約 2000 至 2500 字。
 - (二) 長篇書評：徵求政治科學相關中、外學術著作長篇書評，內容包含 3 至 6 本相關書籍的綜合評論，約 5000 至 8000 字。
 - (三) 書目：針對政治科學相關學術著作之介紹，約 1000 至 1500 字。
 - (四) 讀者回應：對前期刊登之書評的回應，約 1000 至 1500 字。
- 截稿日期：每年二、四、八、十一月十日以前。
- 稿件筆潤：
 - (一) 一般書評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壹仟元整。
 - (二) 長篇書評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參仟元整。
 - (三) 書目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伍佰元整。
 - (四) 讀者回應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伍佰元整。
- 本刊物編輯委員會以尊重稿件內容為原則，力求避免修改，唯保留此項權利。
- 投稿暨聯絡方式：
 - (一) 電子郵件：PoliSciReview@ntu.edu.tw
 - (二) 一般郵寄：台北市中正區(100)徐州路 21 號
臺大政治學系[政治科學季評]編輯委員會
- 線上閱讀：http://politics.law.ntu.edu.tw/research_1.php